

时代之思·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支撑

夏禹龙 胡振平 周罗庚 徐觉哉 著

学林出版社

时代之思·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支撑

夏禹龙 胡振平 周罗庚 徐觉哉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支撑/夏禹龙等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1

(时代之思·中国研究丛书)

ISBN 978-7-5486-0127-2

I. ①中… II. ①夏…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0914 号

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支撑



作 者——夏禹龙 胡振平 周罗庚 徐觉哉

责任编辑——乐惟清 王后法

封面设计——周剑峰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印 刷——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5 1/16

印 张——17

字 数——23 万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86-0127-2/D·7

定 价——38.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重新认识中国

——“时代之思·中国研究丛书”序言

童世骏

在新中国成立 60 年之际推出的这套丛书,是为了更好地重新认识中国。

近年来,谈论“重新认识中国”的,常常是国际场合。面对这个变化迅速、面貌多样的古老国度的时候,外国人常常会感慨他们先前对这个国家的了解已基本过时;受到外国人有意无意的误解和曲解的时候,中国人也常常感到有必要让世界更好地了解自己。不管是先前连续多年保持经济高速度增长,还是当前在全球经济一派萧条景象中依然保持宝贵的信心和信誉;不管是举全国之力战胜特大地震,还是向世界展示美轮美奂的奥运盛况——近年来我们确实有不少理由庆幸,我们没有让重新认识着中国的朋友们失望,也没有让重新认识着中国的其他人小看或轻松。

但需要“重新认识中国”的,不仅是外国人,而且是我们自己——更确切些说,首先是我们自己。外国人有的把中国当作一个“问题”甚至“威胁”,有的把中国当做一种“范式”甚至“榜样”,这些观点值得我们重视,但不宜被我们奉作权威。对我们来说,“重新认识中国”是对自己、对子孙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是我们更好地为人类作贡献的前提。

比方说,“五四”运动 90 年之后,中国的“传统”到底是什么,需要重新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60 年当中,中国的“现实”发生了哪些变化,也需要重新认识。30 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职业活动、这一代人留给后代们的物质遗

产和精神遗产，等等。这些都需要重新认识，特别是需要我们来重新认识。

又比方说，我们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求我们把“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放在更为广阔背景下进行重新认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当然意味着我们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但我们又要看到，已载入宪法的这条原则，在今天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现实语境的。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是资本，因此，在“不要资本主义”的同时，我们还是可以“要资本”的。理论上得到论证的这个道理，是否真能实现？我们是否确实能够一方面利用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另一方面遏制资本的野蛮化趋势？这些问题都没有现成答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不是不科学甚至反科学的社会主义。但经过 60 年的新中国建设和 30 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知道“科学”一方面必须与“人文”相结合，另一方面必须与“民主”相结合。这两个“结合”并不容易，如西方的“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争和“民主政治”与“专家政治”之争所表明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设法实现这两个结合：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就是要把科学和人文结合起来；说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就是要把科学与民主结合起来；说“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民主像我们的社会主义一样也处在初级阶段，因此像社会主义一样也还要大大往前发展。理论上得到论证的这些道理，是否真能实现？我们是否确实能够把科学和民主内在地、有机地统一在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和实践活动当中？这些问题也没有现成答案。

我们的社会主义当然也是具有具体特点的社会主义，而不是超越一切地域、时代和文化个性的社会主义。不管是作为一个基本的哲学道理，还是作为一个深刻的社会常识，这一点都要求我们对自己的民族传统、国情特点和国际地位有更加全面的认识。我们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要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代价，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

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也要更加注重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过程中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并且致力于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这些理论上经过论证的要求如何转变为具有具体可行性的实践措施，也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邓小平说过，“观察中国问题，一定要认识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不仅对外国人重新认识中国，而且对我们的自我认识，也是一个严峻挑战。认识中国意味着“了解中国”和“理解中国”，这两者虽可以适当区分，但终究是相互依赖的：“理解”的基础是“了解”，而真正意义上的“了解”也离不开“理解”。“理解”中国不仅要描述中国（知其所然），而且要解释中国（知其所以然）和评价中国（知其所当然）。对中国作这种意义上的“理解”，中国人有独特优势，但也需要格外小心：重新认识自己的祖国，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观察，但也切不可没有客观的观察。对中国的国情，不作调查没有发言权，不作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让我们怀着对祖国、对人民、对子孙后代的崇高责任，持着对知识、对真理、对科学研究的满腔热情，更好地认识中国，更好地重新认识中国吧！

2009年3月

前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改革开放以来长期的探索和奋斗、日益自觉地高举的一面标志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什么样的理论以及这种理论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中国实际和时代与广大群众的要求,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当然应把社会的物质力量放在第一位,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①对于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政党来说,具有先进的理论作为行动的指南,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特点和优点。恩格斯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②列宁也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也就不可能有革命的运动。”“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③而能正确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就只能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依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并不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步形

①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②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8页。

③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27、328页。

成的,而是早在抗日战争初期由毛泽东首先提出的。他在1938年10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说:“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色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后来,考虑到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特别是苏联的态度,就不再使用这一提法,而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而更多地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样的表述,但基本内涵并没有改变。当时,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矛头主要是针对以王明为代表的脱离中国特点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态度,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又重新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2001年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所形成的两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邓小平理论则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2007年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更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列在改革开放以来十大宝贵经验的首位。今天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再一次强调,同样是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髓的基础上,根据变化了的时代条件和中国特殊的国情,总结建设和改革实践的具体经验而逐步形成和完善的科学概念。它赋予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中国特色的民族形式,其客观依据有如下几点:

一是时代的变化。资本主义从马克思曾生活于其中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肇始于 19 世纪末的垄断资本主义；又从 20 世纪上半叶以两次世界大战为标志的资本主义制度各种固有矛盾的极其尖锐化转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上述诸矛盾的趋于相对缓和；以至于到后来时代主题也由战争与革命变为和平与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幅员广大、具有超级人口的大国，时代的这一系列的变化必然会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产生不容忽视的巨大影响。

二是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差异。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在发达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充分发展的条件下通过政权更易而建立起来的。而中国在革命前是一个社会生产力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处于不发达的初期。尽管经过 61 年的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至今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离发达的程度还很远。建立在这样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主义，不能不带有其明显的民族特色。

三是文化传统的区别。中国的文化传统与西方的文化传统有着明显的区别。就政治文化来说，西方自古希腊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民主形式和制度，从而形成民主的思想文化传统，尽管这种传统在中世纪一度中断，但在资本主义关系在封建社会内部形成以后，这种传统就易于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得到恢复。同时，古罗马时也已经形成比较完备的建立在契约关系基础上的法律制度，法制在人们头脑中有其较好的思想基础。而中国长期来是一个专制宗法社会，皇帝具有无限的权力，不存在一切人都要遵守的以契约关系为基础的法律制度，也缺乏民主的形式和制度。近代以来，特别是辛亥革命以后，情况有了一些变化，但仍未实现根本性的变革，因而民主和法制观念在人们头脑中还较为薄弱。同时，西方在中世纪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只是在 14 世纪以后，封建君主才借助资本主义关系的形成和发展，逐渐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而中国早在公元前 1 世纪自秦皇朝始，就建立起统一的民族国家，并且基本上保持了 2200 多年，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可见中华民族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文化传统上的诸多区别，必然会影响到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中国的民族特色。

二、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针对性

当前,我们重新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为贯彻这一意图相应地作出具体的工作部署,决非偶然,它同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

一是针对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对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但是它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离开我们已有一百一二十年之久,其间世界发生了多少惊人的变化,显然不能要求他们一一预见,都作出准确的回答。正如邓小平所说:“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①我们不应因马克思、恩格斯有一些论断现在看来已经过时而感到遗憾和不解,倒是应该因经过这么多年的变化,他们仍有那么多的理论精髓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扬而感到欣慰和惊喜。可是,有些人却并不是这样看问题,他们相信马克思主义,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并不端正。在他们身上存在着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所指出的,“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倾向。由此,他们就不能紧密地与现实生活的生动发展相对照,正确区分马克思等的著作中哪些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哪些则不是。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有一个对它的全面认识和结合现实生活有侧重地把握的问题。因为真理总是具体的,而“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②。因此,如果静止地孤立地看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那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它和运用它。例如,关于解决矛盾的方法,我们通常总是强

①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1页。

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3页。

调矛盾的新的一方取代旧的一方,也就是“一个吃掉一个”,这在革命时期无疑是正确的、必要的,但这并不是解决矛盾的方法的全部,还有另一种解决矛盾的方法,即矛盾双方并不互相消灭,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马克思认为:“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①特别是在建设时期,我们要更加重视运用这种方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不是一条条孤立存在的,在不同的基本原理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不能割裂开来把握。例如,《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是我们经常引用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②并把它概括为“两个必然”的基本原理。但是,马克思还有“两个决不会”的基本原理,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③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强调前者而忽视后者,那么我们会犯急性病的对基本原理教条化理解的错误。

二是针对忽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和阐发。有些人在立论时一味强调中国特色,而忽视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相衔接,甚至有意回避或违背某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须知,我们所提出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的“中国化”。我们的理论如果不回溯到马克思主义的原点,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精髓,那就不能理直气壮地称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缺乏能掌握群众的彻底性。例如,马克思历来重视所有制问题,认为革命运动的一般特征就是要解决所有制问题,而共产党人“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④。是否把所有制问题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是马

① 《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2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63页。

③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3页。

④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5页。

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主要的区别。可是,有些人在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时,却避而不谈所有制问题,似乎这个问题已经无关宏旨了。也有些人把分配看作社会主义的本质,他们把不触动私有制主体地位而强调公平分配的民主社会主义推崇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统继承者。可惜,这违背了历史现实,因为目前所有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政党都已经不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指导思想了,最好的也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其多个理论来源之一。我们不能一厢情愿地把已经自认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硬封为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早就批判过“把所谓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的观点,认为这“是根本错误的”,并明确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①看来,在所有制问题上,如何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在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里,推行的是以私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模式,而中国所实行的也是多种所有制的并存和混合。如果没有在对待公有制的态度上的不同,没有以何者为主体上的差异,那么请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在经济上究竟还有多大的区别呢?何况,仅就通过分配提高社会福利保障、缩小贫富差距方面来说,北欧的一些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做得还比中国更有成效些(当然这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有关,不可等量齐观)。至于什么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曾有核要的表述,即它“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以后13年过去了,非公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已占三分之二左右,但是至今只看到对此“毫不动摇”的一再表态,而对于主体地位的如何具体判定,除了重复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那几句原则性的话以外,没有任何进一步的细化和阐发。这是亟待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作认真

① 《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页。

的研究和探索的。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点

针对上述两种倾向,我们要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就要研究和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哪些理论基点,一方面向上回溯,真正做到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一脉相承;另一方面又要向外扩展,化为战略、方针、政策以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这样的理论基点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哲学层次。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而世界观是理论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世界观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指导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①在这个层次,大致上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寻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点:

1. 唯物史观。正确理解社会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各方之间的相互关系,特别要重视生产力对社会发展的最终的决定作用;把“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有机地联系起来思考,而不是把它们孤立起来,割裂开来。

2. 价值目标。马克思恩格斯把共产主义社会表述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那样的联合体^②。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把“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又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过去我们往往强调集体的权益而对个人的权利有所忽视。针对这一点,我们要妥善地处理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把两者更好的结合作为我们的价值追求。

3. 认识论。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③“人

①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5 页。

②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73 页。

③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8 页。

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①1978年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这对于反对个人崇拜、否定“两个凡是”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如何用实践去检验真理,还存在不少问题,有待深入探讨。因为实践是以其结果是否达到人们所预想的目的来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而社会生活领域里的实践,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实践,它不可能把活生生的人放在实验室所设置的严格约束条件下,形成单一的因果对应,从而其实践的结果必然是复杂多样的,既有积极的,又有消极的。何况,检验真理的实践不是一次完成的,它是一个过程,从而其结果又有眼前和长远之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检验其认识的真理性,就离不开价值的因素。

4. 方法论。矛盾的斗争性和统一性是矛盾的两个相互依存的侧面,不可或缺,但又可以在不同条件下有所侧重。在革命时期,我们侧重斗争性,强调通过阶级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到了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就应该更多地关注统一性,以便协调、整合社会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关系,实现和谐发展。相应地,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从强调开展你死我活的斗争以求消灭对方,转变为强调协调、兼顾,求得动态平衡。

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来研究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方面的现实问题而得出的一些属于应用基础理论层次的基本理论观点:

1. 市场和资本。计划和市场都是社会主义需要运用的经济手段。党的十四大依据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的精神,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既是资本发展的产物,它的存在又为资本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不仅私有制财产是资本,而且公有制财产同样是资本。社会主义在加强宏观计划调控的同时,将长期与市场共存,与资本共存,与资本主义的不同在于资本结构。马克思对于资本有极其深刻的剖析,一

^①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页。

方面充分肯定资本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因为它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它一定要突破现有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手段的限制,决定了它一定要突破现有的消费数量、消费范围和消费种类的限制”^①,能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对资本在近代所造成的种种恶果,进行详尽的严肃的批判。以往我们往往牢记马克思对资本的批判,而对于他肯定资本的历史积极作用却不够重视。而在当前的中国,资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在到达其历史极限前尚有漫长的过程,我们应该全面认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概念规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宏观计划调控下,不断改进和调整资本结构,以利于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尽可能限制其消极影响。

2. 国家和民主。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的性质和功能有如下规定:一是认为它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②;另一是认为它的功能是缓和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之间的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之内”^③。在革命时期,其任务是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我们自然要强调前者,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去达到此目的。在建设时期,我们显然就不再需要去打碎自己的新的国家机器,而是应强调后者,通过国家去协调、兼顾、整合社会各阶级、阶层、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以缓和他们之间的冲突,达到和谐的目的。如果在这时还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那就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的一个祸害”^④,在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占有生产资料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独立行动以后,就要把

① 童世骏:《资本的“文明化趋势”及其内在限制》,《学术月刊》2006年第10期。

②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6页。

③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

④ 恩格斯:《〈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6页。

其职能逐渐归还社会而自行消亡。^① 尽管由于时代特征和社会历史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革命胜利后,社会主义国家机器还将长期存在而远谈不上消亡,但是逐步扩大公民社会的功能则是题中应有之义;那种让国家权力无限扩大、完全控制社会的社会主义苏联模式,显然是违背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的。我们对国家权力及其行使人可能滥用公共权力保持高度警惕并行使有效的监督,也是很有必要的。马克思总结 1871 年巴黎公社的经验,主张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应实行比资产阶级国家更彻底的民主制。恩格斯也明确地指出:“我们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实行统治。”^②在当代,民主是一股势不可当的世界潮流,但它的发展又是有条件的,需要有一个讲究次序的推进过程,需要采用适合当时当地实际的形式。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处理好民主与权威(或威权)的关系。我们不能把权威与民主绝对对立起来,又与专制等同起来。其实,权威在现代社会是必需的,这早已被恩格斯在《论权威》中充分阐述过。权威对于社会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当然权威有不同的性质,有依靠暴力迫使人们服从的权威,有依靠个人魅力树立的权威,也有依靠民主的合法程序建立起来的权威。发展民主,不是要否定和取消权威,而是要改进权威的作用机制,以好的权威取代坏的权威,以可持续的稳定取代一时的稳定。因此,发展民主既应是积极主动的,又须重视当时当地的社会条件,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以及历史文化传统,力求避免或尽量缩短权威真空现象的出现;否则,就会导致社会的混乱无序,不仅严重地破坏了经济,而且也丧失了民心。

3. 一元和多样。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意识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既然当前中国的社会里,存在着不同的阶级、阶层、社会利益集团,那么,其文化思想领域必然是多

① 参见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438 页。

② 恩格斯:《对 1891 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412 页。

样化的。可是,作为其指导思想,又应坚持一元化,即马克思主义。正如马克思所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①而为了达到统治的目的,就“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惟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②。无产阶级不同于历史上其他统治阶级,它在取得政权后,不需要虚假地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而是现实地使自己的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达到高度的一致,即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是我们需要坚持和可能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道理。但是,指导思想是一种社会价值导向,只能说服人们自愿地接受,而不能强求。在文化界、思想界应该鼓励人们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但也应该允许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不违反有关法律的学派和流派存在。这是“多样并存、一元指导”的精义所在。

4. 统治和领导。在近现代,一个阶段要取得和保持政权,政党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恩格斯指出:“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立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③一个政党成为执政党,它就有了统治权。统治权依靠政党的力量,具有强制性。但是,要保持和巩固执政地位,单靠统治权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拥有领导权。领导权是非强制性的,是社会大多数公民自愿接受的。这里就包含一个执政的合法性问题。新中国的江山是由共产党率领人民解放军打下来的,它的第一代领袖具有很强的个人魅力,因而它的执政具有历史的合法性。然而,新中国成立至今已有61年了,代际变迁,这种合法性的功能已经逐渐消减了。成功的经济发展,居于当前合法性的主要位置。不过经济发展不可能长期一帆风顺;要持久地保持和巩固执政地位,必须多方面地增强合法性的基础。其中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

③ 《恩格斯致格·特利尔》(1889年12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9页。